

藏族棋文化的见证

——关于在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发现的藏族石刻棋盘的学术报告

扎拉 达娃桑布¹ 著 扎雅 洛桑普赤² 当增扎西³ 译

(1、西藏自治区民族艺术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0;2、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西藏 拉萨 850000;
3、民族出版社,北京 100013)

[关键词] 石刻棋盘;藏族棋文化;藏围棋;文物;抢救

[摘要] 文章是作者赴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出生地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对亲眼所见的藏族石刻棋盘进行调查研究的报告文章。作者通过对藏棋的名称、规则、判定输赢的方法等作的介绍,以及对这块石刻棋盘和有关的藏族历史所作的研究,认为早在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藏围棋已在藏区广泛流传,是藏区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活动,并且传播到中国西藏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鲜明的藏民族特点。最后,作者呼吁学者加强对藏棋的研究,并殷切希望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加强对珍贵文物的保护,以免这些珍贵文物被倒卖和毁坏。

[中图分类号] K87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07)02-037-05

笔者于 1999 年夏季的某日在朋友霍康·强巴丹达家做客时,听他谈及关于墨竹工卡县甲玛乡乡民于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内发现一块刻有奇异图案怪石的事。霍康·强巴丹达说他正拟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索朗旺堆前往考证,并邀笔者也一同前往。不日,我们便动身来到了拉萨以东 70 公里处的墨竹工卡县甲玛乡。强巴敏久林宫遗址位于墨竹工卡县甲玛乡西山脚下,藏历火牛年,也即 617 年,曾声名显赫、征服四方诸小国并施行二律善法、以严正强盛统驭诸域、睿思宏智殊胜、政教诸事贤达,并为相邻诸国所畏惶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就出生于该地,其

父乃为吐蕃王囊日松赞,母亲为蔡邦氏朱玛托噶尔。如今,该宫殿已满目疮痍,眼前的废墟令人感慨万千、无从言说。

我们随即采访了住在该遗址附近的村民扎西,他指着放在自家门外西北角的一块石头说:“几年前因为盖房子,在遗址废墟上掘土挖石,挖到 2 米多深时发现了这块刻有奇异图案的石盘”。并说:“同时挖到的还有一个陶制的皮火筒口,因当时没在意,已让小孩当玩具摔碎了。”这块石头厚 18 厘米、长 117 厘米、宽 55 厘米,成不规则长方形;石头的两端有两个石槽,石槽直径为 11 厘米、深 5 厘米;石头中央刻

[收稿日期] 2006-07-12

[作者简介] 1、扎拉·达娃桑布(1962→),藏族,西藏白朗人,研究员,主要从事西藏艺术理论研究。

2、扎雅·洛桑普赤(1971→),女,藏族,西藏察雅人,藏汉翻译学硕士,主要从事藏汉翻译及语言研究。

3、当增扎西(1963→),藏族,甘肃夏河人,编辑,主要从事藏语言文学研究。

有长 44 厘米、宽 44 厘米、纵横 17 × 17 格的棋线；两边还刻有类似“卍”之类的各种图案做饰。我们郑重地向村民扎西等人说明，此乃藏族古代棋盘，属国家重点文物，切不可不加保护随意弃置。于是，众人将此棋盘搬放至扎西家院内墙隅。

嗣后，霍康·强巴丹达担忧该遗址若不加保护，任由村民继续采挖修盖房屋，不久，遗址将有可能完全消失。于是，霍康·强巴丹达出于于心不忍，偶或亦与笔者相询，并屡次提交了要求“区党委领导、当地乡领导，以及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并尽快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的书面请求。于是，该棋盘很快得以进入自治区博物馆大门，但当时因不了解其重要价值，只是搁置在院内的一间小房里。当笔者和强巴丹达得知此情后，即刻找到博物馆领导恳切请求尽快对其进行研究并善加保管。博物馆很快对此高度重视，而且向霍康·强巴丹达敬献哈达并授予其“霍康·强巴丹达先生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将在松赞干布出生地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发现的珍贵石刻棋盘交送自治区博物馆，为表嘉奖，特颁此证”的荣誉证书。甲玛乡政府和村民扎西也得到了哈达和 500 元的奖金（其中甲玛乡政府 300 元，村民扎西 200 元）。后来，我们虽向自治区博物馆几经请求，要求对该棋盘进行确切的研究和鉴定，然至今未果。俗话说：“公鸡不打鸣，驴声可替代”，于是，笔者尽个人所能试着研究起了该棋盘。

关于藏棋文化的渊源，虽难以指出确切年代，但可以肯定藏棋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汉文史书《旧唐书·吐蕃传》在述及吐蕃政律时载有“围棋陆博，鼙鸣鼓为戏”一句，恰好被此次在松赞干布出生地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出土的石刻棋盘作了印证。据传，历史上曾出现过“棋王”的西藏日喀则谢通门县民间流传着“围棋是苯教仪式中的一种方术或占卜生死的不吉祥物”的说法。工布苯日山也有民间传说：“从前有一佛僧至苯日神山一带，居于当地的苯教徒不悦，欲与其比智，然彼此语言不通，遂以棋艺相决，苯教胜。”以上这些传说表明藏围棋不仅与苯教文化有着关联，而且，其历史远比佛教传入藏地的时间更为久远。有些人认为棋艺是从印度、祖国内地或蒙古传入西藏的，然而，各种迹象表明此类观点均与事实不符。苯教经典中虽然很难发现记载有“密芒”（围棋——译者注）这一名称，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前“冲”、“得乌”、“苯”乃为吐蕃治理国政不

可缺少之方略，因此，可以肯定藏棋亦属于“得乌楚”占卜。关于这一点著名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其《古代象雄与吐蕃史·底斯之光》一书中有明确记载。该书在述及“得乌楚”占卜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占卜中最为古老的占卜法时写到：“先前，经恰勒嘉所请，敦巴玛卫桑格向其传授部分‘锐见’占卜法。该占卜是对人的生辰五行等内界元素与自然界的外界元素之关系进行研究来占卜善恶的一种方法，此乃原始苯教所独有的一种意识行为，所以可知‘锐见’占卜法具有原始占卜的特点”。该书又载：“后来，有些苯教徒根据帕巴降央为敦巴玛卫桑格之神的说法，将敦巴玛卫桑格与敦巴辛饶理解为两个不同的人，其实，为恰勒嘉传授‘锐见’的敦巴玛卫桑格与敦巴辛饶实为同一人，因此，将敦巴玛卫桑格看成是敦巴辛饶的化身未尝不可。‘锐见’占卜术的名称为‘得乌楚’，有卜测未来之意，后人称其为‘得周’（6 个棋子——译者注），大概是因其用 6 个棋子卜测吉凶祸福而得名的。但‘得乌楚’一般可用 42 个石子或玻璃进行占卜，虽大致可称之为‘得’（石子——译者注），然并非只能用 6 个石子占卜或必须用 6 个石子。事实上，由于‘得乌楚’在藏语中不易发音，一般人亦不解其义，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为‘得周’。”该书还详细记述了将石子放入 9 个图谱的具体方法。

虽然很难断定藏围棋与“得乌”占卜间有何直接关联，但根据以上谢通门县民间流传棋乃苯教仪式、为占卜死难之法的说法，以及西藏山南地区朗县恰日寺精通苯教的老人们所说：“以前此地有 9 × 9 的棋盘，我们从小知道如何玩法”等说法来推断，后来的 17 × 17 线格藏棋，有可能是根据“得乌”占卜术等演变而来的。17 × 17 线格棋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时期极为流行。囊日松赞之权臣琼布邦赛，曾割后藏小王玛尔莫首级，将玛尔莫之土地和属民献给囊日松赞。琼布邦赛本人棋艺高超，据敦煌文献载：“琼布邦赛闻三孜扎、四协吉扎即可识之，密芒技艺无可匹敌。”军事家琼布邦赛亦如此喜爱和精通棋艺，由此可以肯定，藏围棋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而且亦是一种有益于军事策略的特殊方法。

关于藏围棋的研究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以后若能对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区和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北部等地流传的与藏棋有关的藏族文化进行正确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开藏族历史的一些盲点，也可以证明远古藏民族的智慧。然而，长期以

来,我们的先祖及后人将棋视为赌博及娱乐的工具,对其渊源的关注甚少,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只能见到由汉族学者和若干外国人篆写的零星论文。由美国藏学家皮特·秀特尔著、《西藏研究》藏编辑部副编申德康·索朗曲杰编译的《藏棋研究》记述了至今为止关于藏棋研究的一些看法,现着重引述如下几点:一是《中国围棋》杂志编辑、第一篇藏棋文章的撰写者程晓流先生认为,藏围棋于 7 世纪由某个汉族人带入西藏;二是日本人黑结木、美国人帕日柏林和皮特·秀特尔等人撰写论文并发表于《日本围棋》和《美国围棋研究》等杂志,他们与程晓流持不同观点;三是《西藏文学》主编闫振中所撰《黑白世界》一文载于《雪域文化》杂志,该文认为棋艺自古就盛行于祖国内地和藏地,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论证了藏围棋史要长于汉围棋史的事实。这些由汉族和外国研究者撰写的论文主要是依据汉藏历史资料、民间传说或棋技习惯而作的分析和研究,但他们谁也没有得到像 7 世纪前的该石刻棋盘之类的任何文物,因此,谁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各自的观点。通过对松赞干布出生地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出土的石刻棋盘的研究,可以得知松赞干布之前藏地就已经有 17×17 线格的藏围棋,关于这一点若详细研究与强巴敏久林宫相关的历史便可明白了。

强巴敏久林宫是松赞干布的父王囊日松赞在战胜森波杰王赤邦松后,在原森波杰王的属地墨竹甲玛林修建的一座宫殿。囊日松赞为实现父王达日年塞统一藏地诸部之夙愿,征服居于吐蕃东、西、北地的各部落,首先卫藏一带多被统治。从汉地引进医学和历算学,于北方开采食盐;以红色黄牛乳汁和泥建造赤孜本都宫殿;依靠雄厚的实力拓展了疆土。具体情况据敦煌古藏文文献载:“赞普伦赞与伦果二人与娘·曾古、韦·义策、韦·梅囊、韦·布策、农·仲保、蔡邦·纳森等歃血为盟,立誓从此背叛森波杰王,尽忠悉补野,并竭力扶持悉补野王,信守秘密,不听信他人,不惜牺牲生命效忠赞普赤松赞,决不后悔。娘·曾钟、娘·穆森、蔡邦·那古、韦·梅囊、韦·布策等也参与盟誓。然后,除王兄伦果和母后东增二人留守宫中外,其余人均按计划带领各自人马出征。娘·曾古与农·仲保二人先行侦察,赞普赤松赞由韦·义策与蔡邦·纳森护驾并带领一万人马出征。他们跋山涉水、穿林越谷,终于攻破宇那城堡,杀死魁首森波杰王,芒波杰王孙波则兵败逃遁突厥,自此,帕之雍

瓦纳以下、工布哲纳以上之大片领土归属赞普。赞普下令将地名岩波改为澎域。娘氏、韦氏、农氏三位大臣将森波杰王的政权悉数献与囊日松赞。囊日松赞论功行赏,将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 1500 户赏给娘·曾古;将辛氏撒格之属地及墨竹地方的奴隶 1500 户赏给韦·义策;将农氏奴隶 500 户赏给农·仲保;将温地方孟氏堡寨 300 户奴隶赏给蔡邦·纳森。自此,娘氏、韦氏、农氏、蔡邦氏等四大家族效忠悉补野王,得到大片领土和众多奴隶,得到赞普重用。敦煌古藏文文献所载的上引历史乃赞普囊日松赞之北伐史,该赞普首先继续父王达日年塞征服班巴王、章格尔王等几个小邦国的事业,征服卫地森波杰王后,将驻地从青瓦达孜迁往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墨竹地方,建立了强巴敏久林宫,并以其为政治中心。嗣后,囊日松赞出兵击败后藏王木尔曼,将达布地方收为属地,为卫藏的统一和疆域的扩大奠定了基础。但因扩张疆土过甚,或对有功之臣封地、赏奴过多,几千年来长期割地而居、互不统属,加之自古就有相互吞并之例,且建立统一政权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因此,囊日松赞晚年时,达布、工布、娘布等地奴隶主暗中勾结,预谋造反,边远地方的象雄、苏毗等邦国也开始背叛赞普,最后,囊日松赞的亲信与叛军勾结将其毒死。敦煌古藏文文献载:“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叔臣奸恶,母臣叛离,外戚象雄、苏毗、达布、工布等反叛,父王囊日松赞被进毒遇弑。”于是,囊日松赞之年仅 13 岁的王子松赞干布,在娘·芒波杰尚囊、噶尔·芒相松囊、琼布·邦赛苏孜、韦·义策等大臣辅佐下,登上赞普宝座。从此,赞普以文武各种方法,依靠扶持他的权臣,安定内乱,征服东北的苏毗、吐谷浑等。依照父王的弘愿,为使藏地统一、百姓安居乐业,赞普研查卫藏地域情况,与大臣协商于红山上修建布达拉宫,巩固了政权,并为高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强巴敏久林宫不仅由囊日松赞修建、为赞普松赞干布的诞生地,而且也是囊日松赞到松赞干布前半生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因此,该宫殿遗址出土的任何文物都具有重要价值,此次于该地出土的石刻棋盘其珍贵程度以及作为吐蕃时期历史见证物的事实谁又能够否认呢?!

霍康·强巴丹达先生就有关该石刻棋盘的事向其伯父阿沛·阿旺晋美写信垂询。阿沛复信写到:“今悉贤侄于 1999 年前往甲玛时,于强巴敏久林宫

遗址发现 17×17 线格石刻棋盘,遂向上级反映。现该文物由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研究,使珍贵文物免遭流失。贤侄此举乃一大功德,向我询问有关 17×17 线格棋的运用和来源也是恰当的。此前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在此略加说明:本人于 27 岁时担任朵基札萨克喇嘛图登却丹和苏康苏巴旺钦次旦二人的干事,也即朵麦粮饷官 4 年期间,德格远郊牧区与类乌齐曲林牧区因东西地段草场相交而发生纠纷,造成人员伤亡,我奉二位札萨克之命前往调解。此次纠纷非常严重,当时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喇嘛,倍受纠纷双方尊敬,他说:‘德格远郊牧区和类乌齐牧区地界处有一巨大石坎,该石坎上刻有专门为格萨尔王与王妃珠牡游玩时下棋的棋盘,相传这个棋盘就是两个牧区的地界。’于是,我带领双方代表专门前往察看。那里确有一个正方形石块,上面刻有非常清晰的 17×17 线格的棋盘,因此,可以断定藏族以前就有 17 线格围棋。我在十六、七岁时也玩棋,并曾与一些贵族和当时拉萨八廓街上棋艺高超的克什米尔商人、汉族人、回族人一起玩过密芒,但当时玩的只有 17 线格的密芒。至于现在的 19×19 线格围棋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出现的,以前未曾见闻过。”

与以上书信内容相关的一些资料简要引述如下:同振中在《黑白世界》中引述了一段苯教经典故事,其梗概如下:佛教未传入西藏前的某个时期,一个小孩因父亲被杀,长大后想报杀父之仇,于是就下棋占卜吉凶时日,得到占卜启示并将仇敌杀死。约翰·帕日柏林先生在《围棋在世界屋脊》一文中写到:五世达赖圆寂后,第司·桑杰嘉措与拉藏汗间的矛盾日趋激烈。由于军事势力相当,双方都知道若武力征战,将会两败俱伤。于是权衡利弊后,双方决定以比赛棋艺论定输赢。经过三个回合的棋艺较量后,第司·桑杰嘉措不仅败下阵来,且于 1705 年被拉藏汗杀死。此后,藏族人认为围棋是不祥之物,并且忌讳玩围棋,藏围棋因此渐渐失传。这篇文章还引述了 1959 年 4 月 2 日锡金王子与日本专业棋手比赛 17×17 线格棋艺的事情,并附有对阵图例。据《中国围棋》杂志编辑程晓流说:近一个世纪以来,藏棋基本没有任何变化。在西藏发现的古代密芒均为古人刻在石块上的 17×17 线格的棋盘,现在在四川、青海等地的广大藏区不仅还能见到,而且这些地方的民间有许多与藏棋有关的传说,牧民们认为这些地方的密芒是一千年前格萨尔王玩过的棋艺。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可以得知,17×17 线格的藏围棋很早以前就在藏区流传,而且到后来,这种棋艺逐渐流传到了锡金等中国西藏周边地区。

以下对“密芒”这一称谓作一分析。“密芒”一词在一千四百余年前就已运用,后来随着历史发展中语音的不断变化,字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敦煌文献中的古文“尼芒”(𑖦𑖳𑖫𑖪)一词,后来演变成“密麦”(𑖦𑖳𑖫𑖪)或者“密芒”(𑖦𑖳𑖫𑖪),这是众所周知的。无论“尼芒”还是“密芒”毋庸置疑都是根据棋盘上的棋格而得名的,但“密”作为棋盘上的棋格,“芒”是根据其数目的增多而需要增加的棋子,将棋盘和棋子合起来叫“密芒”,我想更为恰当。但有些人根本不加考虑“密芒”的藏文正字法,将其写成“密玛”(𑖦𑖳𑖫𑖪),理解成靠眼睛打仗,此乃少见闻之过亦。另外,藏围棋的一些名称也独具特色。例如:棋盘的 4 个角“苏希”称为“则希”(四顶——译者注);正式下棋前,双方各下表示划定地界的 6 个棋子,称“波”;棋盘最中央的棋格称“贡”;棋子下在每个棋眼上称“具”,等等。这些名称由于藏语方言的差异和古今藏文词汇的新旧演变,在听觉上对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感觉,但谁都知道其实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概念。其次,根据笔者与敦布巴·图登坚赞先生交流后知道的情况来看,藏围棋的下棋规则也具有独特性。例如:首先,黑白棋子双方各占棋盘的 2 个角,同时,在第 3 条线的周围各摆称为“宝”的 6 个座子,然后双方轮流下“具”。若对阵双方智慧不均,弱方将会向强方要求各种数量棋子的“甲恰”(意为让棋——译者注);若双方势均力敌,则抛掷黑白棋子分出先后,棋子面朝下者先走,先走者至少会赢半个棋子。原因是 17×17 线格的棋盘共有 289 格,共需棋子 289 个,双方各有 144.5 个棋子,但到最后 0.5 个棋子时就没法下,因此,获得 145 个棋子的一方实际上只赢得对方的半个棋子。然后开始下“具”,下“具”的特点是用 6 个棋子在棋盘的角上组成 2 个眼,叫“则拉年莫珠恰”(角上形成 6 个鱼——译者注);用 8 个棋子在边线处组成 2 个眼,叫“达拉夏瓦杰恰”(边上形成 8 个鹿——译者注);用 2 个棋子并排组合在棋盘的任何一处,叫“密芒迪吾尼须拉,朗钦达密扫噶乃”(两个棋子并排列,彪悍大象命辰居——译者注)。另外,通常“具”还有“则具”或“达具”、“杰具”或“吉具”、“安具”或“奥具”等。也有将好的“具”称作“姜具”(骏马棋——译者注),把坏

的“具”称作“旁具”(毛驴棋——译者注)的叫法。而且,在线格上放一个供思考的底朝上的棋子,称为“萨多”(思考棋子——译者注),等等,具体需在实践中领会。此外,判定输赢的方法也有一些特点,例如,一个棋子被对方棋子夹住吃掉,这叫除掉“阿悠”,对此不许马上回击,只能在其他地方暂时下“具”。当自己要被击败时扬言“棋乃坏事暂遗留”,将对方注意力引向它处,设法补救。若此处无周旋余地,双方都下“年恰”。“断隔乃是棋之术,断隔多则必自毁”,若将属于自己的 2 个棋子“则莫”和属于共同的 1 个棋格“贡”都输给了对方,就称为“则杰贡杰”,要判定失掉了 25 个棋子,如此等等诸多。另外,在西藏有些地方,下棋时对阵双方通常都有根据情况相互对辩的习俗,对辩的内容是将棋子比喻成野兽和飞禽等,对阵双方便以猎杀者的姿态相互傲慢豪语对谑。这种做法虽与棋艺并无直接关联,但从这点上可以说明藏围棋与骰子一样是一种具有藏民族特点的娱乐活动。

“密芒”是自古生息于雪域高原且有特殊体能和智慧的藏族人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正如俗话说:“密芒棋子甚狡猾,女子比之更狡猾”,视密芒为深奥之学。该学问的类别也并非偶然形成,而是依靠计算和智慧逐步形成的。正如藏族文化的根基是土生土长的苯教文化一样,从密芒的历史长短和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密芒的传说来看,它是与苯教文化

相系而产生的。因此,若能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发展和完善藏族文化事业将起到重要作用。归根结底,就像谚语所说:“炒青稞最终磨出的是糌粑”一样,此次笔者撰写这篇研究松赞干布出生地强巴敏久林宫遗址出土的石刻棋盘的报告文章,其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党和政府虽然相继出台了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和法规,但到了基层和地方,由于内外各种原因,实际很难具体有效地落实,偷盗、倒卖文物,以及毁灭古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笔者撰写本文,就该石刻棋盘对于研究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历史所具有的价值作了说明,希望能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起到一点作用。同时,也恳切希望各级管理部门不要辜负党和政府的希望,有的放矢,让祖先遗留下来的珍宝免遭破坏和流失,以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为保护和管理工作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恰白·次旦平措等编.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下)[M]. 陈庆英等译. 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0.
- [2] [意]南喀诺布. 古代象雄与吐蕃史 底斯之光[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 [3] [美]皮特·秀特尔著、德康·索朗曲杰译. 藏棋研究[J]. 西藏大学学报,1994,(2).
- [4] [美]约翰·帕日柏林著、德康·索朗曲杰译. 围棋在世界屋脊[J]. 西藏研究,1994,(3).

The Evidence of Tibetan Chess Culture :A Report on the Discoveries of the Chess Board in the Ruin of Jampa Migyur Ling Palace in Gyama Valley

Written by Dralha ·Dawa Sangpo¹ Translated by Draya. Losang Phukri², Tenzin Tashi³

(1、Institute of Tibet Nationality Art Studies,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2、Tibet Archive Bureau,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3、The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013, China)

Key words :stone carved board, Tibetan chess culture, cultural relics, save, value

Abstract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ent to Gyama Vally of Maldro Gongga County where is the loation of the birthplace of the Tibetan King Songtsan Campo and given an overall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f the area. Through the terminologies, rules and game results of the chess, the author carries out a systmat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ibetan chess game. He points out that prior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Buddhism in the Tibetan plateau, chess was popular in Tibet with the Bon religion and it was one of the common recreations among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game was even spread into the region around Tibet with distinguis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betan culture. Finally, the author requests all the leaders and concerned offices at various level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relics in order to protect all the cultural relics of Tibet and prevent them from destruction and selling.

[责任编辑:德吉卓玛]